

文革和六十年代青年理想主義 ——從毛澤東重提五四運動說起

● 賀照田

文化大革命這一幾億人參與其中的政治運動，有些人是主動投入的，有些人是被捲入其中的。在主動投入的人群中，有些人是在時代時勢中出於各種利益考量投入的，有些人則是出於理想主義，或二者兼而有之。在出於理想主義而投入的人群中，文革發動前就被理想主義、政治社會責任感強烈激盪的知識青年（以大學和高中生為主）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他們不僅是文革前期紅衛兵運動的要角，而且是文革後期開始醞釀的、文革結束後新時期文學思潮、思想運動、社會運動的重要當事人。

在本文中，我嘗試梳理毛澤東在1963至1966年間對青年期待的講述，一方面通過論述文革發動前後青年理想主義和毛對青年期待之間的關係，揭示中國大陸1960年代青年理想主義的主要內涵；另一方面則通過毛把五四運動和文革關聯起來的視角，揭示文革初期青年理想主義和毛規劃文革之間的結構性關係。而這樣一種歷史—思想討論，也隱含如下歷史—

思想認知意識：當我們面對文革中的諸多歷史—思想經驗時，不應對這些思潮、經驗的興起與挫折作過於急躁、籠統的解釋，而應進入這些思潮、經驗所在的具體歷史—思想脈絡中加以把握、分析，才可能有更深刻、更準確的認識與評價。

一 1939、1966年毛澤東的兩次五四講述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也是文革當事人毛澤東等自以為文革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而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五十周年。從1978年底新時期開始至今四十餘年，關於五四運動、文革的討論汗牛充棟，但我卻未見有文章就毛在1966年底把五四運動和文革正面關聯起來這一問題，加以特別注意和討論。

毛澤東是在他1966年12月26日七十三歲生日談話中^①，把五四運動和文革關聯起來把握的。毛的有關思

考，很快被寫入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②：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相結合，就出現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性的批判，出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這個新高潮的重要標誌，就是紅衛兵運動和革命大串連。

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一發現紅衛兵這樣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無限的生命力，歌頌它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給予堅決的熱烈的支持。……

革命大串連，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宣導的。革命師生在全國範圍的大串連，把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連成一片。……

……

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份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這是客觀的規律。作為我國現代革命史開端的五四運動是這樣，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按照這個客觀規律進一步地展開。

顯然，在1966年底毛的意識裏，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和大串連，讓他想起自己當年投入過的五四運動，並希望與要求參加這些運動的青年知識

份子，能和他在五四運動後一樣，走堅決和工農群眾結合的道路。

當然，毛澤東這樣一種把五四運動和文革關聯起來的理解，與他之前對五四運動的理解密不可分，而這特別表現於1939年5月1日他發表在《解放》第七十期上的文章〈五四運動〉，以及5月4日所作的〈在延安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③。這篇文章和演講稿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作者特殊的政治領袖身份，以及他賦予五四運動歷史位置、歷史意義的方式所產生的廣泛影響，還在於這是作者首次作如下斬釘截鐵的論斷——知識份子應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 and 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④。因為這樣的認識，毛一方面高度評價五四運動：「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歷史上叫做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甚麼作用呢？起了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份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甚麼叫做先鋒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⑤；另一方面認為五四運動所開創的這樣一種革命先鋒隊運動方式還不夠，必須和工農群眾結合。

強調知識份子應該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可以說是毛澤東從這時開始至1976年逝世一直貫穿始終的觀點。

但若細究起來，我們便會發現，由於時代問題脈絡不同，毛賦予的時代意義期待也有不同，故他在不同階段強調這個看起來相同的觀點時，實際上承載的歷史、思想、社會、文化意涵也有所不同。同樣，他於1966年底把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軌迹，概述為「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份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認為「這是客觀的規律」，因此，「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應該遵循這一規律：「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按照這個客觀規律進一步地展開」，強調毛理解的五四運動及其革命後續和他這時寄望於文革的展開兩者之間的共性，但若考慮到五四學生運動和1966年文革開始時學生運動所處身的脈絡相當不同，我們便不能不特別注意1939與1966年講話之間的巨大差別。

沿着毛澤東1939年對五四運動的討論方式和本文的討論關懷，一定要提出的，就是1939年毛以如下方式看當時的延安青年運動：「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現在全國別的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的青年們根本不同^⑥，延安的青年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驅，因為他們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運動，應該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⑦——若聯繫這前後毛的其他表達和相關史實，就會清楚看到毛高度評價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因為這時的中共已經很大程度被毛自己

認可的認識與實踐方向所主導（他在革命理論把握方面和與中國現實深度結合方面都很有自信），延安尤其如此。是以，在延安的青年知識份子、學生身處這樣的氛圍與格局中，積極按這時中共的期待和要求去學習、去實踐，當然被毛認為是對的。與之相比，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之外的青年就沒有這麼幸運，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同樣正確的青年運動。

不過，毛澤東這樣一種對五四運動及其革命後續的理解，也讓我們了解到，看起來同樣是學習革命理論，同樣是努力於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實踐，毛這一代五四運動的親身參加者，也就是直接脫胎於五四青年一代的革命者，其學習與實踐，是在較少規限的情況下，着重發揮個人主體性與思考自覺；與之相比，1939年延安知識青年被認為正確的學習與實踐，則以毛這曾經的知識青年一代的學習與實踐所得出的時代結論為前提，也就是他們在被規限路徑與方向的前提下學習革命理論，在被規限位置與感覺的前提下努力與工農群眾相結合。

了解隱藏在毛澤東1939年對五四運動及其革命後續理解之中的這些歷史—認知環節，有助我們看清：毛在1966年底看上去不過是在重述1939年他對五四運動及其革命後續的理解，但實際上1966年的理解所承載的意涵在某些方面和他1939年講同樣的話時的時代承載非常不同。毛在1966年底重提五四運動及其後續經驗，其時代前提是他發動文革時對中國現實的判定、通過文革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對文革初期以紅衛兵運動為代表的青年知識份子運動的樂觀判定。

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對當時中國現實的看法，是認為文革發動前的中共及其所創造的國家，存在着很強的修正主義危險，若不及時加以充分改造，到他不在時，修正主義就會成為主導中國的力量。是以，一方面，年事已高的他認為時不我待，需要在他掌權之時徹底改造中共及其創造的國家，去除中國變修的危險，保證中國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另一方面，究竟改造後的黨和國家應該是一個甚麼樣的具體面貌、甚麼樣的實踐組織形式、甚麼樣的制度形式，等等，對於當時的毛來說，則只有一些觀念方向，並無實踐藍圖。這些觀念包括如何在年輕世代中造就出一批人，使這批人成為將來領導改造後中國的黨、國、社會的中堅力量，在中國再度出現修正主義危險時，確保他們一定能夠作為把中國再次拉回革命道路的核心力量；也就是說，本來應該在毛發動文革時想好或至少基本想好的一些重要方面，事實上沒有勾畫出相當程度的實踐路線圖。

我們也可由此想像1966年底毛澤東特別提起五四運動，其內心是非常興奮的。紅衛兵運動的迅猛發展及其在文革開始時他最關心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起了先鋒作用」，讓他想起當年熱烈參加過的五四運動；以紅衛兵為主體的革命大串聯，則讓他想起五四運動後自己投身其中的知識份子走向社會大潮。這甚至讓他不能不進一步幻想，若文革也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發展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為革命的知識份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不僅社會可因之受到更充分的改造與教育，而且青年知識份子也會因之充分成長，

從中一定可湧現出一批像他一樣的革命者。

因此，我們便清楚明瞭毛澤東在1966年底對五四運動經驗的援引和1939年講述五四運動時，在現實指向上的重大差別。在1939年的講述中，應該怎麼革命、怎麼學習革命理論、怎麼和工農群眾結合，毛認為已經被他這樣的五四一代所清楚認識，因此對現實中已經走在毛（據這些認識）規劃出的青年道路上的延安青年來說，重要的便是進一步堅持、進一步落實這些指引，至於還沒有走上這樣道路的青年，要緊的是盡快踏上這條正確的道路。

是以，毛澤東1939年的五四講述，特別肯定現實中延安的青年，要求青年堅定不移相信共產黨、跟從共產黨。而1966年底毛的五四講述，一方面固然顯示現實中的紅衛兵運動、大串聯讓毛興奮，讓毛對當時的青年有樂觀想像、肯定；另一方面則清楚表示，現實中讓毛興奮的青年知識份子，只是有了一個起點。毛認為他們僅僅積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僅僅在大串聯的意義上結合社會還不夠，還必須像五四一代革命者一樣，走更積極、更深入的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以成長為毛期待的理想革命者。也就是說，在1939年毛的五四講述中，由於已經有了他那一代人在五四運動後的成功探索，以及這探索結晶被共產黨所接受，因此聽從共產黨召喚與期待的延安青年便是當時青年的榜樣；而在1966年毛的五四講述中，青年應該學習的榜樣，是五四運動後努力作革命探索的他那一代人，而非以學習與接受他們探索的結果為前提的1939年的延安青年。

二 毛澤東的五四理解與文革展開

毛澤東在1966年底這種參照當年自己的成長經驗，把文革青年知識份子運動的榜樣界定為——五四運動後認真追問何謂中國革命應該走的道路，認真探索最有力扎根中國社會的革命實踐形式——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代革命人，其時代後果是非常巨大的。毛當年的經驗讓他非常清楚，除了馬列主義、蘇聯革命等帶給他的一些基本方向，他之所以能有當年的成長，是因為有太多沒有既定答案的思想和實踐課題要去面對，即在他所說的「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和成長。1964年毛澤東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九評〉）談及接班人五項條件時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⑥，應該就想到了自己當年的成長經驗。顯然，1966年底由紅衛兵運動和大串聯所催生的毛對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樂觀想像，一方面讓他更明確地把此時的青年知識份子和當年五四運動的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相對比，另一方面也強烈推動他下決心為了他所期待的一代理想接班人的出現，必須在向來為中共有效控制的中國，創造出有利於接班人成長的「大風大浪」環境。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把文革推展到一個新階段的元旦社論，之所以在「我國現代史上的文化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一段後，緊接着論斷「這是客觀的規律。……使我國社會主義

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這樣」，然後宣布「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按照這個客觀規律進一步地展開」，並規劃展開的內容，顯然和毛期待文革中青年知識份子也能獲得如他那一代人在五四運動後的革命成長經驗相關。對文革展開的規劃內容如下：

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黨和全國革命群眾面前的政治任務，主要是：

第一，在工廠和農村中，要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大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動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

工廠和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極其重要的。工人和農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必須放手發動工農群眾，鬥垮工礦企業和農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剷除一切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舊東西。只有這樣，才能把資本主義復辟的根子挖掉。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從機關裏、學校裏和文化各界裏，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讓毛澤東思想去佔領一切陣地。如果運動停留在機關、學校和文化各界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

第二，對於學校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師生、革命知識份子，有計劃、有組織地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實行和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

……知識青年、學生青年要下廠下鄉，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組織起幾萬萬人的大軍，攻破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陣地，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

……

下廠下鄉是完成本單位鬥、批、改任務的重要條件。青年學生、青年知識份子，投到火熱的工農群眾運動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能更明確地認清大辯論中的是非。只有工廠、農村徹底實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屬於上層建築的學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徹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廠、農村的實際，聽取工人和農民的聲音，才能切合實際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們的文化團體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為工農兵服務。

第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

第四，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性的批判。

……

由上可見，不論是「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總攻擊」、「大民主」，還是文革一定要「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當然都是決心讓過去被黨和國家嚴密控制的體制與社會，釋放出極大空間，並在這極大空間中掀起「大風大浪」。社論對知識份子下廠下鄉意義的高度

看重，以及對下廠下鄉必須注意的問題的諄諄告誡，一方面清楚告訴青年知識份子，只有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才能真正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知識份子」，才能真正完成自己所在的教育和文化領域的革命變革；另一方面，認為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只有和工農群眾緊密結合，「才能組織起幾萬萬人的大軍，攻破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陣地，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則讓我們微妙但清楚地看到，雖然社論一如這時期其他正式言論，把工農階級的地位放得很高，卻並不認為工農群眾有獨自擔當起「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的能力，而只有直到與知識份子充分結合並為後者所組織與領導，才能有力真正實現這最具決定性的任務。

也就是說，我們若細細推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篇社論，就會明瞭其中關於1967年文革的規劃，實際是以這樣的文革最有助於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完成毛澤東所期待的結果為關鍵想像支點的。沒有這一點作為支撐，毛應該還會因擔心「如果運動停留在機關、學校和文化各界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而把文革擴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中；至於會不會使用一種蓄意的「大風大浪」方式，則基本可以斷定不會。

三 不斷拉高的六十年代 青年理想主義

毛澤東這種參照五四、後五四成長起來的現代革命知識份子（包括他

本人)經驗,所形成的對文革初期青年知識份子的強烈期待,除了對文革的實際展開方式影響巨大之外,還把1960年代青年理想主義推上新的高度。

在相當的意義上,從1940年代初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特別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後,作為黨的領袖的毛澤東、他所領導的共產黨、共產黨所創建的政權之間,開始被視為三位一體的關係,故當時青年擁護黨、擁護政府、擁護毛澤東,也被視為理所當然。1949年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更致力宣傳領袖毛澤東、在優秀領袖毛澤東悉心領導下成熟起來的共產黨,以及由共產黨所締造的國家,都是應該一體信任的。以這樣的認識與氛圍為前提,從1940年代初到1963年約二十年間,共產黨所推動的青年理想主義,都包含如下內容:努力學習革命理論、努力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更好地勝任黨與政府交給自己的任務,三者間是相互促進關係。也就是說,認真學習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代表的革命理論和認真貫徹毛與共產黨的號召,努力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不僅被認為有助於成為一個更堅定、優秀的革命者,而且被認為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黨與國家的各種具體方針、政策,理解黨與國家所交給自己工作的意義,更有助於在具體的工作崗位上發揮主動性、創造性;而個人在所承擔工作中的投入和努力所產生的真切經驗,也被認為有助於培養青年活學活用革命理論的能力,以及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能力。

這種青年理想主義,在1963年3月的「學雷鋒運動」中可說達到了頂點。雷鋒被同時作為認真學習毛澤東

著作的楷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楷模,幹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精一行的楷模,作革命「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的楷模。雷鋒的「永不生鏽」,被認為主要來自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認真對待上級號召,所帶給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高度上的自覺,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飽滿熱情。「螺絲釘」這個用語,隱含着革命「機器」的存在;作為這「機器」的「螺絲釘」應該「永不生鏽」,則隱含了這「機器」本身的正當性、正確性,也就是構成這「機器」的現實中黨和國家本身的必然正當性、正確性。

從「學雷鋒運動」所隱含的上述視角來看1964年6月毛澤東提出、並在7月正式公布的接班人五項條件,我們會發現,毛在對黨和國家所構成「機器」的看法上,1964年實際上已經不復1963年的樂觀。

正式昭告國人接班人五項條件的〈九評〉,首先講了為甚麼要特別提出「接班人」問題:「根據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同志提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就是毛判定蘇聯變修和總結蘇聯之所以變修得出的認識,讓他在回觀中國時,認為中國若不認真面對變修問題,也會存在着變修危險。而如何做到中國不變修,則需要中國制訂更正確且更具警惕性的「路線和政策」,並且需要嚴正注意「接班人」問題。

而「接班人」問題之所以在當時被認為重要而迫切,和中共認為西方的「和平演變」預言並不是沒有現實可能的認識有關——蘇聯變修在斯大林逝世後發生,因此西方預言家推

測在中共第三或第四代也將發生同樣問題：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在這些充滿危機感的義正辭嚴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先前黨和國家觀的搖動，以及新的黨和國家觀的浮現：那就是「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所隱含的正當、正確的黨和國家，並不是必然正當、正確的，若缺少足夠的警惕，缺少和這警惕相配合的路線、政策，缺少對接班人的認真培養，當毛等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後，黨和國家實有着很大的變色危險。

可以說，之前中共並非不注意兒童少年的教育、成長問題，並非不注意青年、青年骨幹、青年幹部的鍛煉、培養問題，也並非忽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而是這一切已經成了黨和國家日常運轉的一部分，一般會

認為按照這些規劃、制度、學習、培養，兒童和青少年都會受到必要的教育，當他們步入社會工作後，在黨和國家所給予的「螺絲釘」位置上被鍛煉和培養，就會在能力和思想品質上有進一步成長。這樣的理解也就意味著接班人會在黨和國家規劃好的軌道上自然湧現，因而不需要特別提出「接班人」問題。

1964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以如此突出的方式特別提出「接班人」問題，恰恰在於：過去被號召應該無條件順從的黨和國家，這時被認為也存在着變修危險，需要黨和國家更警惕自己的路線、政策；黨和國家先前教育、培養年輕人的方式，尤其被認為需要重新調整、設計，方能保證中國在毛澤東一代過去後不改變顏色。也即，過去被樂觀看待的黨和國家將要面臨的現實挑戰，使得「接班人」問題需要被特別鄭重提出。



1964年毛澤東談及接班人五項條件。(圖片來源：《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第1版。)

而1964年出現的這樣一種過去沒有的新意識，也當然使毛對「接班人」有更明確、更高的要求。他在〈九評〉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如下：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仔細看這五項要求，就很清楚這些標準是很高的；滿足這些標準的人，是可以勝任中高級幹部的。毛澤東這裏所指的「接班人」，不是限指中共領袖或至少高級幹部的接班人，

而是「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千百萬」意味着此時毛把本來適合中高級幹部的五項要求，提給了廣大青年，至少提給了有很強革命志向要求的青年。而對於過去在黨和國家規劃的軌道上運轉和學習的廣大青年來說，是不可能得到這種鍛煉和成長的，毛當然也清楚這一點，故文章緊接着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在「大風大浪」中才能成長出他所期待的接班人，毛澤東這樣的理解放在1964年無疑有它的激進性。革命後成功建國，本來應該是「大風大浪」的結束，從此應該盡可能有條不紊、專心致志地進行革命建設；即使有時不能完全避免驚濤駭浪，也是一時與局部的。而這時毛一方面強調「接班人」問題的無比重要，一方面又強調接班人要「在群眾鬥爭中產生」、「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要「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培養接班人」，意味着毛對於在黨和國家過度規劃、控制的軌道中培養出來的幹部信心不足，因而思考要否為了他期待的「接班人」的真正養成，而創造一個「長期的群眾鬥爭」、「革命大風大浪」的環境。從毛這一理解我們亦可以知曉，文革初毛之所以對劉少奇派強勢工作組領導文革的方式極為反感，當然和工作組是順承現實中毛急欲通過文革突破與改造黨和國家的既有狀態有關，也和此處清楚呈現的理解緊密相關——沒有真正的「群眾鬥爭」，沒有「大風大浪」，就不能真正有毛期待的「接班人」湧現。

對比1963年3月在整個中國大陸鋪開的通過號召學習雷鋒所推薦給年輕人的青年理想主義，和1964年7月用接班人五項條件推薦給年輕人的青年理想主義，我們可以看到，「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式的成長要求和「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的成長要求之間存在極大差別。一年多時間內之所以有這麼大差別，背後反映的是黨和國家應否無條件信任青年的問題。1963年青年理想主義的重點是作「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意味着擁有不竭的熱情與能力，把黨和國家的方針、規劃，在自己工作環節上充分、完美落實，最為重要；而1964年青年理想主義強調要有「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歷程，則表示理想的接班人只在被指定的工作崗位上（也就是「螺絲釘」範圍內），即便有能力勝任和具有不竭的工作熱情還不夠，還需要在更複雜的形勢和環境中具備極強的獨立判斷是非的思考力，以及在更廣大的人群範圍中團結與組織周圍人群的能力。即不僅要有完美勝任常規革命工作的能力，而且要有在極其嚴峻的環境中面對複雜、艱鉅的課題，把握局面、駕馭挑戰的堅強意志與傑出能力。

是以，1964年毛澤東所期待於青年的青年理想主義，比1963年「學雷鋒運動」所期待於青年的理想主義，在如下兩個方面有特別提升：一是把過去實際上期待於中高級幹部的能力與精神、思想品質要求，現在也延伸到廣大的年輕人；二是認為只要給青年更獨立、更具挑戰性的鍛煉和成長環境——「長期的群眾鬥爭」、「革命大風大浪」，相比在黨和國家規劃、設計過多的環境中，他們反而會有更重要、更關鍵的成長，更能成為毛所

期待的理想「接班人」，而這意味着對青年的主體潛能有更強信心。

與1964年接班人五項條件所對應的青年理想主義相比，1966年底毛澤東參照自己當年成長經驗所產生的對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期待，以及與此期待緊密配搭的「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這一在程度上無以復加的「大風大浪」式文革設計，可說又把青年理想主義再向上提升了一步。一方面，毛覺得當年他那一代人走過的道路，是文革中青年知識份子可以走也應該走的道路，實際上，他在期待青年知識份子中出現一批和他一樣的人，他們的出現將保證中國未來不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即使出現這樣的危險，這些人也有能力把中國重新帶回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毛這時所號召的青年（1963年中共還期待他們作為「螺絲釘」）對現有黨和國家「機器」的文革造反，且是一種如此規模的「大風大浪」文革設計，意味着毛給青年知識份子極大的信任空間，是對他們的成長可能性有超常信任的設計。也即毛這時所寄望於青年知識份子的，不僅不再是成為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是期待他們成為和當年自己一樣的，能重新打造、重新結構中國，把中國變成保證共產主義在世界實現的「革命機器」，並能有效運轉這台「革命機器」的接班人。

用1963年「螺絲釘」式話語來表達，就是1966年底毛澤東幻想：在號召「螺絲釘」來改造這些「螺絲釘」本來應該倚為信任、信仰的黨和國家「機器」這一造反過程中，產生一批符合他的「接班人」理想、能幫助建設他期待的更具有克服修正主義體質能量的「中國」、並能有效運轉這個「中國」的優秀人物。用今天的表達

便是，1966年底毛對青年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的期待，即期待和要求這些人成為歷史的主體！

四 小結

毛澤東在1966年底如此拉高時代的青年理想主義，並給他所期待的青年理想主義不可承受之重，對於時代青年，特別是積極回應毛有關號召的青年知識份子的影響是甚麼？積極回應毛期待的青年知識份子的努力為甚麼會遭受挫折？有關挫折帶給文革的影響是甚麼？對其後文革的進一步展開有甚麼影響？對後來青年發展又有甚麼影響？這些都是我們認識毛澤東所積極參與塑造的1960年代青年理想主義時繞不開的問題。篇幅所限，得留待另文處理。

註釋

① 關於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七十三歲生日晚飯前後的談話，當天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中有專門回憶。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頁491-506。

②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7年1月1日，第1版，下引不再另註。文章經毛澤東審定，也是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1967年第1期的社論。根據《毛澤東傳》指出，這是「中共中央兩家主要報刊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格外引人注目」。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2430。

③ 關於五四運動的影響史、接受史，一定會提到這篇文章和演講。〈五四運動〉文章和〈在延安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演講稿初版，參見日本毛澤東文獻資

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六卷（東京：蒼蒼社，1983），頁321-37，經修改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其中演講稿標題改為〈青年運動的方向〉。參見〈五四運動〉（1939年5月1日）、〈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558-60、561-69。

④ 這兩段引文初版和《毛澤東選集》版本文字差別很小，意思上全無差別，我此處引用的是後者，參見〈五四運動〉，頁559；〈青年運動的方向〉，頁567。

⑤ 毛澤東：〈在延安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頁330；〈青年運動的方向〉，頁565。

⑥ 「只有我們延安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一句，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被修改為「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參見〈青年運動的方向〉，頁568。

⑦ 毛澤東：〈在延安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頁336-37；〈青年運動的方向〉，頁568。

⑧ 大眾所知的接班人五項條件，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第1-4版，下引不再另註。它根據毛澤東1964年6月16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講話中關於接班人問題的部分發展而成，〈九評〉並且是毛澤東逐字逐句參與討論並實際最後定稿的。另可參見〈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85-88；《毛澤東傳》，第五卷，頁2227-7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62-63。